

中国文化概论

ZHONGGUO WENHUA GAILUN

周桂峰 主编



吉林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化概论

ZHONGGUO WENHUA GAILUN

周桂峰 主编

编委会成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广超	王泽强	朱德慈
许芳红	成守勇	宋灏江
周桂峰	晁 瑞	蔡铁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概论/周桂峰编著.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9.8(2014.1重印)

ISBN 978-7-5383-5300-6

I. 中… II. 周… III. 文化史—中国—古代—文集
IV. R203—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4703 号

中国文化概论

周桂峰 主编

责任编辑 阎爱群 责任校对 申玉龙 装帧设计 吉林春雨教育美编室

出版 吉林教育出版社 (长春市同志街 1997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 江苏春雨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淮安精彩飞扬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字数 268 千字

版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5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83-5300-6

定价 28.00 元



目录

CONTENTS

绪 论	1
第一节 中国文化生成的地理条件	2
第二节 中国文化生成的经济条件	6
第三节 中国文化植根的社会结构	7
第四节 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特征	8
第五节 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	10
第一章 社 会	18
第一节 宗法社会	18
第二节 家国同构	24
第三节 道德规范	29
第二章 政 治	36
第一节 政治制度	36
第二节 政治思想	47
第三节 民主因素	50
第三章 经 济	52
第一节 经济发展	52
第二节 经济特点	60
第三节 经济制度	63
第四节 经济思想	68

第四章 哲 学	73
第一节 发展历程	73
第二节 主要问题	79
第三节 主要特点	86
第五章 宗 教	91
第一节 原始宗教	91
第二节 佛 教	94
第三节 道 教	106
第六章 礼 俗	115
第一节 社交礼仪	115
第二节 饮宴礼仪	117
第三节 婚丧寿诞礼俗	120
第四节 节日礼俗	126
第七章 衣 食	133
第一节 服饰文化	133
第二节 饮食文化	143
第八章 科 技	159
第一节 科技特点	159
第二节 农业手工	163
第三节 交通运输	167
第四节 中医中药	171
第五节 四大发明	175
第九章 教 育	178
第一节 教育制度	178
第二节 教育思想	187

第三节 教学原则与方法	190
第十章 语 文	194
第一节 汉语的历史与特点	194
第二节 汉字的历史与特点	198
第三节 汉语汉字的文化功能	203
第十一章 艺 术	211
第一节 中国艺术的总体特征	211
第二节 音乐艺术	214
第三节 绘画艺术	222
第四节 书法艺术	229
第五节 建筑艺术	239
第十二章 文 学	247
第一节 中国文学的特点	247
第二节 诗 歌	252
第三节 散文与辞赋	265
第四节 中国戏曲	275
第五节 小 说	280
后 记	287
主要参考书目	288

绪 论

中国，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古国，今天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蓬勃朝气，屹立于世界国家之林；中国文化，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系统，今天也以别具一格的魅力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生为中国人，我们既为灿烂的中国文化而自豪，也有责任将中国文化遗产下去，并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文化”，是一个迄今为止仍然被诸多专家争论不休而难以定论的命题。由于人们研究的角度不同，对“文化”内涵的概括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而给文化所下的定义也大相径庭。时至今日，关于文化的定义已不下 200 种。

本书主要依从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所给出的定义：“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① 梁启超强调：一、文化是人类心能创造的成果，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而根据主观动机对客观世界加工、改造，从而形成的物质成果与精神财富。二、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有价值的共业”。文化成果不是某一个个人独自创造、也不可能为某一个个人独自占有，它是人类共同创造，也为人类共同享有的公共的基业。尽管，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文化巨子，他们会对某一时期、某一地区、某一族群的文化做出超越他人的贡献，但他们的创造仍然是有赖于前辈、时人的文化创造作为自己的基础。即便真有“机心独运”的创造，能否最终成为“有价值的共业”，也还要取决于某一时期、某一地区、某一族群广大成员的文化抉择。

中国文化便是五千年来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之上的世世代代的先辈所创造出来的“有价值的共业”。这个“共业”属于包括众多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

^① 载《学灯》1922 年 12 月 9 日。

第一节 中国文化生成的地理条件

文化是人类心智创造的产物。但人类的文化创造不可能在虚空里实现，而必须实实在在依托于一定的地理空间。不同的地理空间，常常决定着文化成果的差异性。那么，中国文化所依托的地理环境如何，便成为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问题^①。

一、中国的历史疆域

中国的疆域，在历史上有过许多变化，但核心区域一般没有变化。夏朝（约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16 世纪）的历史目前虽然还没有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但它的存在不容置疑，而它所统治的疆域已相当广大。经过商周二代约 13 个世纪的发展，到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终于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公元前 210 年，秦的疆域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南至今越南东北和广东大陆，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于海。此后，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虽时有盈缩，但基本的趋势是逐渐扩大、逐渐巩固，不少王朝都曾拥有过比今天国土更为广大的版图。例如从西汉中期至西晋末年的 400 多年间，朝鲜半岛的东北部曾经是中原王朝的正式政区；自西汉中期至明朝末年的千余年间，今越南北部都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唐朝和元朝的北界都远达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唐朝的西界一度直抵中亚的咸海。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最终奠定了今天中国疆域的基础，形成了一个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拥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统一国家。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入侵中国，用武力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中国的大片领土；有的甚至连条约都不签订，直接凭借强力造成侵占的既成事实。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以巨大的牺牲捍卫民族尊严，使国土免遭更大的

^① 本节主要参看张岱年等《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顾伟列《中国文化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损失。

今天，中国拥有 960 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和 300 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北起漠河附近的黑龙江江心，南到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南北相距约 5500 公里；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东西相距约 5200 公里。

二、中国的地理特征

尽管中国的疆域在历史上时有盈缩，但中国素来都以泱泱大国著称，幅员广大，因而也就形成了较为复杂的自然地理特征和人文地理特征。

（一）地形复杂

中国的地形非常复杂，差不多具有世界上的各种特征地貌。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海拔悬殊很大。高山、高原以及大型内陆盆地主要分布在西部，丘陵、平原以及较低的山地多见于东部，宽阔缓斜的大陆架则在我国大陆东南延伸于海下。地势自西而东层层下降，形成地形上的三级台阶，习惯上被称为“三大阶梯”。青藏高原是最高的第三级地形阶梯，被称为“世界屋脊”，海拔在 4000—5000 米，许多山峰超过 7000 米。在高原的东侧是举世闻名的横断山高山峡谷地带。高原内部的巨大山脉间地势宽缓，湖盆星布，长江、黄河、澜沧江等亚洲大河都发源于此。青藏高原往东、往北，至大兴安岭、太行山、伏牛山、雪峰山一线为第二阶梯，其内部地形相当复杂。由此往东是最低的第一阶梯。

（二）气候不同

中国领土由于幅员广大，因而兼有热带季风气候、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带季风气候、高原气候、温带大陆性气候。中国大部分领土处于北温带，即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真正的舞台”^①。中国气候有三大特点：一是季风气候明显。主要表现为冬夏盛行风向有显著的变化，随季风的进退，降水量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二是大陆性气候强。表现为冬、夏两季平均温度与同纬度其他地区或国家有较大的差异。冬季低于同纬度地区，夏季高于同纬度地区，年温差较大。三是气候类型多种多样。这些特点，自古及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 124 页，三联书店 1956 年版。

(三) 相对封闭

中国的东面是浩瀚的太平洋，从黑龙江东部沿海到东南沿海有绵延 18000 公里的海岸。虽然在秦始皇时有徐福乘楼船入海，在唐代有鉴真东渡日本，在明代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对于中国的古人来说，大海终究是存在着太多谜团的畏途，因而始终没有促成向海洋的大发展。西南部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昆仑山、祁连山及横断山脉绵亘不绝，危峰高耸，积雪不化，空气稀薄。其中如横断山脉，山高谷深，阻绝交通，故有“横断”之名。“喜马拉雅”的藏语语义是“冰雪之乡”，主脉大喜马拉雅山平均海拔 6000 米以上，山势巍峨峭拔，雪峰重叠，海拔 8000 米以上的高峰有 10 座分布于此。主峰珠穆朗玛峰耸立于群峰之间，海拔 8848.13 米^①，是世界第一高峰。喜马拉雅山构成青藏高原的边缘，成为中国与南亚诸国的天然分界。西北为帕米尔高原，气候寒冷，冰川发达，茫茫戈壁，漫漫雪海，虽然在汉代已经奠定了贯通戈壁沙漠的“丝绸之路”，但山路崎岖，山岭阻隔，加之高寒干旱，这个地区仍然是令人不寒而栗的西北地理极限。北方为广袤的草原与沙漠，长城内外是历史上中原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斗争与融合的舞台，其外缘以萨彦岭、贝加尔湖、大兴安岭一线为限，再往北因为严寒冻原而人迹罕至。大海、高山、沙漠，四面围护，使中国大陆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离。这样的地理环境，在限制了中国的对外交流与发展的同时，也保护了中国文化的相对统一与完整。

(四) 民族众多

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土上，很容易形成多民族聚居的状况。历史上曾经在中国范围内居住和活动的民族数以十计，除月氏(zhī)族的主体在公元前 2 世纪迁到中亚以外，其他各民族几乎都没有完全离开过中国。在今天的 56 个民族中，除朝鲜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等几个民族是从境外迁入的以外，绝大多数民族都是在中国形成的，或者已在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年代。除汉族以外，匈奴、鲜卑、羯、氐、羌、沙陀(突厥的一支)、契丹、女真、蒙古、满族都曾建立过统治中原地区的政权，其中蒙古族和满族还曾统治过整个中国。但无论是汉族还是非汉族

① 此为 1975 年测量数据，中国国家测绘局 2005 年测得的珠峰高度为 8844.43 米。

建立的政权，都包容其他民族，都是多民族的国家。

早在春秋时代，汉族的前身华夏诸族就已经成为黄河流域的主体民族。以后随着自身的扩张、迁移和其他民族的迁入，汉族融合了大量的其他民族，不仅在数量上高居首位，而且在经济文化上保持着总体上的优势，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和核心。上面提到的这些曾经统治过中原地区的非汉族以及其他很多民族，有的作为一个民族早已不再存在，有的只剩下很少的人口。但这些民族并没有从肉体上被消灭，而是被融合在汉族之中了。例如从东汉至南北朝活跃在中原的非汉族，到唐朝已都被当做汉族的一员，白居易、元稹、元结等诗人和唐朝的许多文武大臣都是非汉族的后裔。同样，汉族人口也曾经大量迁入非汉族聚居的地区，或者被迁入的非汉族所融合。

（五）人口众多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2年在汉朝设置政区的范围内有近6000万人口。未列入统计的少数民族和此范围之外的中国人，估计还有数百万。合计超过当时世界人口1.7亿的三分之一。12世纪的北宋末年，其境内的人口已经超过一亿，加上辽、西夏境内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就更多，而当时世界人口约有3.2亿，也占1/3以上。1850年，世界人口达到约12亿，而中国当时人口已突破4.3亿，所占比例仍在1/3以上。

当然，在以往的二三千年间，中国的人口并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数量上经过了无数次起落。在大规模的天灾人祸持续发生时，人口损失的幅度常常达到20%以上，有时甚至超过50%。但即使是中国人口的低谷，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一般也在1/5以上。

不过，这样庞大的人口分布并不均衡。公元初，60%的人口分布在太行山、中条山以东，豫西山地、淮河以北、燕山山脉以南的地域内，这一范围内的人口平均密度约每平方公里77人。而长江以南的大多数地区人口稀少，尤其是今浙江南部、福建、两广、贵州等地，还有大片无人区。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一是长安及其近郊，每平方公里超过1000人；一是今山东菏泽、定陶、东明一带，每平方公里263人。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中心的转移，人口的迁移和自然条件的变迁，人口的分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以淮河、秦岭、白龙江作为划分南、北方的界线，北方和南方所占人口的比例从公元初的7:3演变为公元

10 世纪末的 4 : 6。10 世纪以后,主要的人口稠密区已转到南方,其中长江中下游、成都平原、福建人口尤其稠密。19 世纪前期,苏州府(大致相当于今苏州市)的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千人,为全国之冠。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开发地区的扩大,地区间人口的差距有所缩小。到 20 世纪初,以云南腾冲——黑龙江瑷珲(今黑河)一线为界,中国形成了东南人口稠密区和西北人口稀疏区,这一格局至今仍无明显变化。

第二节 中国文化生成的经济条件

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由西向东奔流入海,它们所携带的泥沙积淀成辽阔肥沃的大平原。从太平洋吹来的东南季风,给中原大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带来了丰沛的雨水,为农业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考古发掘证明,在距今约 6000 年的仰韶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已见稻谷遗迹,在距今约 4000 至 5000 年龙山文化遗址和屈家岭文化遗址,也出土有石锄、石镰等农具及粳稻等谷物,这表明中华先民早在六七千年前,已经逐渐告别狩猎和采集经济,步入以种植业为主的农耕时代。及至商周时代,农耕经济已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崛起于中国西部的周人,是典型的农业部族。被周人尊为先祖的后稷,被后世奉为农神。在《诗经》的《七月》、《大田》、《生民》、《良耜》、《载芟》诸篇中,描绘了周代农业生产的真实画卷。以农为本、以农立国,是周人根深蒂固的经济思想和政治理念。早在西周,他们便提出:“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国语·周语上》)这是对农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中的重要地位所作的系统阐述。

周代以后,历代王朝都把重农作为治国之道。以农立国的国策,推动农具的改进,促使耕作技术的提高,大大促进了农业文明的发展。长江流域稻作经济的普及,以及朝廷移民开边屯田政策的推行,使中国的农耕区不断拓展。在近代商品经济发育之前,中国经济结构的主体是自然型农业经济。农耕经济是古代中国立国的基础,也是传统文化赖以发

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除农耕经济外，中国的北方草原自古就生活着强悍的游牧民族。农耕与游牧，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与文化的碰撞和融合，贯穿了中国历史的全过程。由于北方气候周期性的变冷变干，迫使游牧民族南下寻找新的牧场。在中国历史上，东汉至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至宋元、明末至清代，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地区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冲击。一方面，军事征伐和政治角逐伴随着文化的碰撞，另一方面，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碰撞中也得到了交流、互补和融合。除战争外，民族间“和亲”、互市、迁徙、通婚等活动，也促进了中国境内不同类型的文化的融汇，从而逐步形成了以农耕文化为主体、兼容并包、气象恢弘的中华民族文化。

第三节 中国文化植根的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所存在的互动关系。

一、家是中国人的安身之所

卢作孚先生曾经说过：“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的第一重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的第二重社会生活。这两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从生到死，都脱离不了家庭生活，尤其是脱离不了家庭的依赖。你可以没有职业，然而不可以没有家庭。你的衣食住用都供给于家庭”^①。家长对于子孙的精心培育，是希望“养儿防老”、继承香火、耀祖光宗；反过来，子孙也养成了依赖家庭、不肯独立的观念。这种离开了家庭亲族，个人便无所依附的现象，显然与中国的农业社会特点密切相关。

二、乡是中国人的立命之根

农业社会的特点是土著而安居。古代中国几千年来所沿袭的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传统农业模式，国民的主体——农民，大多是稳定地聚

^① 卢作孚《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12页，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族而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①，年复一年，从事着程式化的劳动，也享受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之中，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世代相沿的亲缘关系。“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②，白居易所描绘的情形，虽是一个“世世为婚姻”的特例，但一村一姓、一村几姓，互相联络有亲，长期延续，则是中国古代农村最常见的状况。这种生产和生活的方式，强化了乡土情谊，也养成了安土重迁的文化心理，更因为“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相处，遇事常常不是分清青红皂白，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三、国是中国人的心灵之家

家庭是宗族的构成单位。而一个宗族世代生息繁衍于一个地区，血缘的纽带自然地把宗族成员联结成一个宗族自治体。中国的社会，便由这一个又一个宗族自治体组成。

中国古人对于国的认同，首先是从家与家族的角度开始的。国家动荡，家族就会搬迁，土地就会丢失，原本的熟人世界也会随之失去。这使得原本就缺少个人意识的先民，从家的利益、家族的利益，体悟出国的作用与分量。因而，家、国一体，国、家不分，家与国在中国先民的心目中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国”成了中国人的心灵之“家”。

第四节 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特征

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即多样性与不平衡性，完整性与稳定性，人伦性与伦理型。

一、多样性与不平衡性

由于地域广大、气候悬殊、民族众多、地形复杂，因而促成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由于空间距离的原因，中国文化既存在着南北差异，也有明显的东西不同；甚至在某一相对一致的文化区内，也存在着局部差

① 《击壤歌》，载《古诗源》卷1，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② 白居易《朱陈村》，《白居易集》卷10，中华书局1979年版。

异,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①。由于气候的原因,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各有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各有自己的风俗传统。由于民族的原因,各少数民族虽或多或少地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影响,但各自具有自己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形态,具有自己民族的文化成就。由于地理形势的原因,山地、平原、水乡、草原、雨林、沙漠……各有不同的文化形态。

由于地理条件的千差万别、政治经济水准参差不齐,各地的文化发展也极不平衡。在中国古代,中原地区得天独厚,农业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在政治、思想、文学等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边疆少数民族由于其居留地大多天然条件存在诸多的不利因素,因而在经济方面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而社会形态、政治状况等方面也较中原地区落后。当中原地区已经跨入封建社会阶段,边疆地区的许多民族还长期处于奴隶社会阶段,个别地方甚至长期保持着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活状态。

二、完整性与稳定性

由于中国的地理环境有天然的封闭性:西南是青藏高原,西、北方是戈壁瀚海,行走艰难;东面大海,有 18000 公里的海岸,虽然在秦始皇时有徐福乘楼船入海,在唐代有鉴真东渡日本,在明代还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由于务实的民族性使然,中华民族没有向海洋大发展。正是在这一片四面均有阻隔、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中国文化得以独立自主地发展。尽管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进其他系统的文化因素,但始终保持着本土文化的中心地位,并进而将外来文化加以改造使之本土化。因而,中华文化虽历五千年风雨沧桑而始终保持着自身系统的完整性。

尽管由于地形复杂、民族众多等因素导致文化形态的多样化发展,但由于主体民族文化的强大内聚力,并没有造成文化的更大歧异化,而是朝着融合、统一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南北朝时代的五胡乱华,南宋时代的女真民族统治中原,元朝和清朝则更是蒙古民族和满族统治了整个中国,但一旦进入中原大地,便被灿烂的中华文化所征服,并逐渐被同化,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成为中华文化的共同创造者。因此,尽管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有曲折和风波,但始终保持着主体精神的统一性。

^① 《汉书·王吉传》。

三、人伦性与伦理型

与西方文化相比较，中国古代文化带有明显的人伦性。所谓人伦性，首先是针对天与神而言。中国文化自周代起就逐渐将目光从天与神转向人类自身。尽管中国古人一直奉行着敬天、畏天的信条，但真正关心的总是人类自身。其次是针对宗教而言。中国人信奉宗教，与西方社会有明显不同。中国人并不怎么关注来生的幸福，而是十分关注现世人生的幸福。不论是中国本土的道教，还是被完全中国化了的佛教，都更多地关心当下的生活与心境。第三是对自然而言。西方文化将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用纯粹科学的态度去研究自然并力图征服自然。中国文化则是力图弥合人与自然的差异，在顺应自然的前提下求得人类的福祉。

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也带有明显的伦理特征。中国古人非常重视人的道德建设，将所有人都纳入到道德教化的序列之中。儒家提出的“仁”，首先就是针对统治阶级提出来的。它要求统治者不仅个人要做到“仁者爱人”，更要凭借手中的权威施行仁政。对于“君子”与大众，儒家提出了一整套的道德规范。即便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礼制内容，其实也都包含了严格的道德内涵。而宋明理学的“内圣”追求，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强调的是士大夫自觉的道德修养与人生自律。

第五节 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特定的地理环境，助成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基础；而农业社会的聚族而居，则自然地形成了稳定的人伦关系，从而催生出以宗法制度、专制制度和“家国同构”为特征的社会形态。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制约着文化的发展与走向，积久便形成了以人为本、求是务实、贵和尚中、念乡爱国为标志的文化精神。

一、以人为本

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但落脚点则是以人为本。中国文化从人类自身的存在出发，以人为中心建构起带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强调人本位，将天、地、人三者并列，而以人为宇宙的中心，认为人是“万物之本”，“最为天下贵”。

在中国文化中，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相参”。考察事

物，明辨物理，既要“上揆之天”，“下察之地”，还要“中考之人”。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特别是儒家，一贯反对以神为本，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立场。孔子虽然承认天命，但对鬼神一直采取存疑的态度。他教导弟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弟子问他如何事鬼神，他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弟子又问人死后的情况，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可见孔子是将现实的人事、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而将事奉鬼神、人死后的情况放在可以置而不论的位置。正因为孔子在骨子里不相信鬼神，所以他也不相信祷告有效。当他病重时，子路请求为他祷告，他用“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婉言谢绝。可见，“子不语怪、力、乱、神”（同上），不仅是口头不说，而且是自身不做与“怪力乱神”有关的事。至东汉仲长统（180—220）则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全后汉文》卷89）的观点，将儒家的人本思想表达得最为明确。

以人为本，在政治理念上表现为民本思想。老子认为，统治者必须顺应民意，“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49章），谴责“以百姓为刍狗”的做法“不仁”。孔子则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并有“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主张；他所倡导的德政，以“裕民”为前提，希望统治者“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其后，孟子对民本思想作了系统发挥。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孟子·尽心下》），明确提出“民为国本”和“政得其民”的思想。稍后的荀子也有类似的思想，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载舟覆舟”的道理，在后来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对政治家起着警示作用。

以人为本，在哲学思想上表现为对神的否定、对来世的否定、对灵魂的否定，因而也就成了抵制宗教神学的思想武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宣扬灵魂不灭、三世轮回的观念，世俗之人颇受影响，但先进的思想家奋起辩驳。南北朝时，何承天（370—447）作《达性论》，指出：“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人“禀气清和，神明特达，情综古今，智周万物，妙思穷幽赜，制作侔造化”。因此，不能把人与飞鸟虫蛄“并为众生”。而且，“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